


中共執政六十年

——從集體主義到個體主義



2009年是中共立國六十周年，對中國人來說，一甲子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走過一個循環，可以重新開始。際此時刻對中共的執政作一反省，對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實有裨益。

中共的崛起不能不追溯到中國近代史的脈絡；而中國近代史又是與西方（特別是英國）國家的工業文明發展史分不開的。工業文明作為一種新的文明，以壓倒性優勢從西方向非西方擴展。不論是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抑或是李定一的《中國近代史》，都認定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面對西方的進迫，中國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變革——也就是現代化。

長期以來，中共官方都以馬列主義的「帝國主義侵略論」來解釋這段歷史。在這種觀點下，一些身負重任且有革新思想，但不得不與西方列強簽訂城下盟的清朝大臣，一律被劃為「賣國賊」。改革開放後，這種極左觀點正逐漸改變，曾國藩及李鴻章等清朝重臣從「賣國賊」轉變成正面人物甚至變成「愛國者」。

一些海外論者則常用現代化理論的「器用—制度—思想」之三階段論來解釋中國革新知識份子對西方挑戰的回應^①。這個理論架構最大的問題是將這三種反應的行為模式放在三個不同的時序 (sequences) 上，形成不同階段。事實上，一項主張或政策之推出或落實，可同時包括這三種層次 (dimensions)；例如，百日維新時期設立京師大學堂，它首先有思想的成份（認識西式教育之重要性），其次它是一種制度之開始（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最後，它是訓練學生的地方，這是器用的層次。其實，清廷的整個洋務運動也是由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所點燃，沒有這種認知上的照明，其後的變革是不能想像的^②。

終清朝滅亡止，改革派士大夫的變革幅度大抵如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般對「中學」的解釋是指「綱常倫理、禮條規範」，「西學」則指「開鐵礦、製船炮、建鐵路」等洋務。事實上，所謂「中學為體」的「體」更是指當時的宮廷體制，用現在的語言表述則是政治制度。保守派張之洞所要的是帝制不能

所謂「中學為體」的「體」更是指當時的宮廷體制，用現在的語言表述則是政治制度。保守派張之洞所要的是帝制不能變，其他的都可以變。從這個觀點看，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仍是清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

變，其他的都可以變。梁啟超論及「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⑤從這個觀點看，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仍是清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李澤厚提出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主張，可說是頗有顛覆性的。當清朝真正實踐「西學為體」——引入西方的強國之源憲政實驗時，清朝已經快要給革命淹沒了^④。

一 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命運

朝廷的士大夫受到諸多限制，寸步難移，並不稀奇。相比之下，民間的知識份子就大膽得多了，例如《國聞報》中就有抨擊中國的政制：「自秦政以愚黔首，私天下。視國為君之私業。」^⑥康有為、梁啟超之推動百日維新，意圖建立英國或日本式的君主立憲政體，可惜，僅百日即告緞羽。其後，國運日衰；義和團之亂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更被割成不同範圍的勢力圈。後清廷雖下詔籌備立憲，然內部腐化已深，積重難返；而孫中山之革命學說及行動深入民間，吹遍全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二千年之帝制，建立了一個共和國體制，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

從社會思想史發展角度看，不論是君主立憲體制或是共和國體制，在西方的發展都是落實自由主義的政治形式。康梁當時嚮往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天皇帝制以及在日成功施行的新政，這種制度最多是「開明的專制」而已^⑦。後來他們和孫中山及章太炎等人在《民報》及《新民叢報》激辯革命或改良時，口徑才稍為讓步，肯定君主立憲制度的意義，其目的是保全帝制的延續性。

晚清國運日衰，革新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早已知道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問不足以應世變；他們亦知道西方國家制度之形成有深遠的思想及理論基礎，於是大量譯介外國的哲學、社會及知識論新思潮。從嚴復所譯述的八種外國著作中，可見他們多麼飢不擇食，其中包括生物學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赫胥黎[Thomas H. Huxley]著)；經濟學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Adam Smith]著)；政治學的《社會通詮》(*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甄克思[Edward Jenks]著)；政治哲學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穆勒[John S. Mill，又譯密爾或彌爾]著)；方法學的《穆勒名學》(*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穆勒著)；社會學的《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著)等。

其中《天演論》帶來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對中國知識份子衝擊最大^⑧。《群己權界論》是穆勒《論自由》的嚴復譯本，而《論自由》是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今天仍令人捧讀不已。整本書的中心是在肯定人是理性的動物下，論述人性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但這種發展必須要在自由的環境下才能成功；國家、上帝以及群體(majority)均不能成為阻礙個人潛能自由發展的藉口。但是，這樣精湛地闡釋個人自由的經典著作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大影響，反而是轉述達爾文(Charles Darwin)學說的二手著作《天演論》，影響遍及整

《論自由》這部闡釋個人自由的經典著作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大影響，反而是轉述達爾文學說的二手著作《天演論》，影響遍及整整幾代知識份子。這就不能不歸諸晚清中國知識份子追尋「財富與權力」，以求「富國強兵」的大背景上。

整幾代知識份子。這就不能不歸諸晚清中國知識份子追尋「財富與權力」，以求「富國強兵」的大背景上。

在歐洲的發展史上，自由主義是伴隨民族國家之興起而產生的。它也是文藝復興之後一股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思潮。自由主義者關注的中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國家／政府的關係。就人來說，每個人都有不可出讓 (inalienable) 的權利，是謂人權；而國家與人民也應該有一個分界線，各不相逾，最高之分界機制是民主機關所通過的法律。自由主義者視國家／政府之權力膨脹為對人身自由的重大威脅。從肯定人權的觀點論，自由主義可以等同個體主義。在種種歷史的必然及偶然條件下，自由主義與西方現代強大的國邦體制同時興起，以強權的面貌出現在被入侵的國家面前。在其他落後國家，並不可能在自由主義與富國強兵之間找到這樣的有機聯繫。自由主義在經濟理念上以私有制為基礎，市場經濟是其鋪陳的土壤之一。

李澤厚曾以「救亡」與「啟蒙」概括近代中國兩大思潮之盛衰。「救亡」成功的是社會主義，而「啟蒙」的自由主義思潮始終不能成為救國的工具。他的說法大致上是對的，不過他對自由主義之分析並不詳細^⑧。

社會主義源自歐洲，它是對自由主義所創造或促成的一種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反動及抗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它針對的是原始資本主義的產生對勞工的剝削以及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

二 社會主義思潮在近代中國的興起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社會主義源自歐洲，它是對自由主義所創造或促成的一種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反動及抗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它針對的是原始資本主義 (亦即無管制的市場制度) 的產生對勞工的剝削以及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它一開始就以資本積累、商品，以及勞動力等現象為分析單位，並不以「人」為單位。人不過是資本以及勞動力的載體，分別形成資產階級及勞動階級；因此，它是一種集體主義。這種集體主義符合中國近代「集體困局」 (collective dilemma) 最本質的條件。至於在 1949 年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還需要另一些的思想及社會條件的配合^⑨。

早期資本主義之不公刺激了社會主義思潮之誕生。當時有多種社會主義思潮流行，及至馬克思及恩格斯自稱的「科學社會主義」崛起，才在歐洲形成強大的思潮及社會運動。然而，資本主義是一個處於不斷變動的社會經濟制度，這種變動以不斷向外擴展的方式表現出來。整個十九世紀，歐洲國家不斷擴展，亞、非、拉洲的國家絕大多數成為英、德、法、荷等國的殖民地；英國更被稱為「日不落帝國」。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述集中分析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動能，對其擴展全球之關係，卻着墨不多。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西方大國，以先進科技及武器作為後盾，征服世界較落後的地區，將世界變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由此，將「階級」主導的社會主義運動變成以「民族」為主導的革命。

列寧開啟了「民族共產主義」的時代^⑩。他建立了第一個基於武力的共產主義政權，也就是這種思想伴隨着政權的形式，進入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視野。晚清傳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零碎不全，梁啟超也曾略為介紹。第一個對科學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 作系統性介紹的，是五四時代的李大釗。他在五四時代的

《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對俄國1917年10月的社會主義革命表示支持。這一次以俄國政權實體支持的馬克思主義就像拋在乾柴上的烈火，在中國迅猛地燃燒起來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代表12名（傳聞另有一名俄羅斯人），代表着全中國57名黨員。1928年的中共六大代表84名，全國黨員4萬多名。抗戰勝利之後，1945年七大召開時，黨員激增至120萬。1987年十三大時，黨員達4,600餘萬。至今，中共黨員已達7,000餘萬了。中共成為世界最大的政黨；以人口論，也超過了英國和法國的全國人口。

中共創立之後經二十八年之武裝鬥爭而奪取了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一甲子。對於中共推翻國民黨而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事後有種種解釋；不過，意識形態顯然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候，並非純粹的抽象學理思潮，同時亦是一股現實的政治組織力量；當時傳入中國的，並非僅僅是文字艱澀的哲學理論，而是戰鬥性猛烈，處處尋求建立一個堅強核心黨的列寧主義。列寧在俄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表示好感，並願意放棄在華的不平等條約，這就贏得中國知識份子的好感及尊重，也導致後來國共兩黨的組織形式都深受蘇共的影響；日後孫中山更提出聯俄容共的政策。

列寧在俄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表示好感，並願意放棄在華的不平等條約，贏得中國知識份子的好感及尊重，也導致後來國共兩黨的組織形式都深受蘇共的影響；日後孫中山更提出聯俄容共的政策。

三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主義化

作為「救國」意識形態的馬列主義，具備了中國激進知識份子所夢想的一切內涵。首先，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一方面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如經過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及資本主義，以至最後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它指出了未來理想社會（共產主義）出現之必然性，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所決定的。這個思潮所提供的社會發展的方向性以及樂觀性，正是吸引大批知識份子之磁力所在。

其次，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資本主義社會內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適應而產生的階級鬥爭以至於兩極分化的現象，經過列寧所轉引為全球資本主義形成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民族鬥爭，正印證了中國在當時世界局勢任人魚肉的階級地位，令中國人特別有代入感。全世界宛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西方列強是資產階級，中國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雖受壓迫，但推翻資產階級是歷史之必然^①。

此外，馬克思主義強調革命（實踐）是印證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曾說過，以往的哲學只是解釋世界，而他的學說則是要改變世界。這種革命實踐的性格傾向，比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更進一步，符合了中國知識份子亟於救國的急切情懷。一生在革命行動中打漩渦的陳獨秀成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並非是偶然的^②。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給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哲學理論基礎（辯證唯物論）以及歷史觀（唯物史觀），列寧主義則道出了革命奪權所需要的組織方法。毛澤東曾說過中共奪取政權靠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以及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是具體的策略，黨的建設才是關鍵性的。列寧主義式政黨的核心觀念有二，

一是先鋒黨的觀念：在落後國家或地區進行革命，工人階級並不本質地有階級覺悟，反而要靠革命知識份子；二是組織的形式：民主集中制。列寧主義式的政黨是高度集權的，往往只有集中而沒有民主。中共的列寧主義性質至今未變。

毛澤東也許接受了列寧的建黨模式，但卻否定了他奪取政權的行動模式——城市暴動模式。毛澤東認為城市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堡壘，不易攻破，反而廣大的農村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空間。「農村包圍城市」才是致勝之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日本侵華變成實現此主張的附加有利條件。

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曾指出，中共領導的革命可以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階段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內，主要鬥爭對象是帝國主義，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③。這一階段的中共，顯然是「民族共產主義」的實踐者。也正是這種民族救亡性質的革命，令中國大量的精英知識份子變成它的同情者，甚至是積極的參與者。

從1949到2009年，眾所周知，中共的統治分為兩段時期：前三十年毛澤東或他的思想主宰的時期和後三十年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時期。本質地說，這兩個時期也就是毛澤東所指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不過次序剛剛倒轉了。趙紫陽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不過是新民主主義更為複雜及理論化的表述而已；其目的是映照毛澤東思想超越時代的盲動及左傾^④。

有理由相信，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的種種政治運動，如鎮壓反革命運動等，以及思想或文化的清洗運動，如清算電影《武訓傳》及胡適思想等，都是中共整個黨的集體意志之表現，儘管毛澤東的極左主張已露頭角，如十五年的過渡期迅即被拋棄，土地改革後未幾即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在蘇聯，列寧逝世後，史大林和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的鬥爭也是縈繞在革命成功後，國家往何處去的問題。鬥爭的結果是史大林的「民族共產主義」(一國社會主義) 戰勝了托洛斯基世界性的「不斷革命論」^⑤。毛澤東思想一身兼有這兩種論點。他在「民族共產主義」革命成功後，迅速轉向了「不斷革命論」，實是列寧、史大林以及托洛斯基的合體。

1956年的反右派運動，是中共向知識份子群以及不滿中共執政的人士進行的大規模清洗，而所用的引蛇出洞、出爾反爾的手法令人驚心動魄。此後，知識份子變得鴉雀無聲，再不敢偏離毛澤東的正統路線了。

毛澤東也許接受了列寧的建黨模式，但卻否定了他奪取政權的行動模式——城市暴動模式。毛澤東認為城市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堡壘，不易攻破，反而廣大的農村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空間。「農村包圍城市」才是致勝之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 極權主義體制的極致與崩解

在強大政治力量的統合下，配以意識形態的認受性以及民族主義的狂熱呼喚，中共建立了一個黨政軍高度集權的體制，並以馬列毛主義統一了全國的思想；在組織上，中共的黨細胞滲透到每個人的生活裏，通過人民工作的單位，黨組織控制了每一個人由出生到死亡的一生。這個高度集權的政經社體制，其

實在1950年代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的《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Nová třída) 一書中得到清楚的表述，他說^⑧：

當代共產主義乃是具有三種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種極權主義。第一是權力，第二是所有權，第三是意識形態。此三者皆為獨一無二的政黨或……由一個新階級所獨佔。……在歷史上，甚至當代歷史上，從未有一種極權制度——共產主義例外——能將這些要素同時並用，而控制人民到這種程度。

這裏所謂「權力」是指政治權力，黨壟斷所有的政治權力；「所有權」是指經濟財產的擁有權；「意識形態」是指思想的認受性不容許挑戰。建國六十年後，第一項並無改變；第二項改變最多；而第三項則稍為鬆動了。

在這樣的體制下，靠着中央政府集權的調配能力，全國資源湧去國防工業以及其他的重工業領域，中國的國防力量得以迅速提高。這就令現今的中共經濟學家褒稱在1950年代初步建立了重工業體系。

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中共理論界面臨轉捩點。如何分析現今中共所處的歷史階段，從而提出未來的走向，在中共高層領導出現了分歧。1956年，中共八大認定社會主義改造正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因此黨的中心要務是發展生產力，盡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中共九大要等到1969年才召開，從日後的黨內鬥爭來看，毛澤東是不同意八大的分析的^⑨。

毛澤東面對的困難在於，在1949年後哪裏去找一個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呢？既然地主階級及資本家都已經被清除了，階級鬥爭的對象何在呢？——他終於找到對象，而且理由是頗為動聽的。這個名詞是「黨內資產階級」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走資派)。對毛而言，資產階級是一個剝削的階級。而在新中國，中共已經壟斷了全部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力量，除了這個黨以外，還有誰能有權力剝削別人呢？這樣說來，毛澤東的「黨內資產階級」不是與吉拉斯的「新階級」有相類似的內容嗎^⑩？不同的是，吉拉斯的「新階級論」是把整個共產主義制度當作極權主義加以批判，而且該書出版之後，他立即被褫奪所有職務並遭到囚禁；毛澤東則仍然信奉共產主義制度，而他是黨政軍最高領導，有機會實踐自己的理念，於是文革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社會基礎以李澤厚的分析最為中肯。他說，1950年代後，由於觀念、制度上的等級主義與服從主義、「一言堂」、「唯上是聽」等，人民群眾充滿着不快、不滿和憤怒。於是，「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矛頭直接指向各級黨政領導，這個運動之所以能如此迅風疾雨地發動群眾自發地搞了起來，人人參加，來勢猛烈，毀壞力極強，其重要原因正在這裏。」^⑪

在權術的運用上，毛澤東是無與倫比的。細看毛澤東的自傳，他的鬥爭性格好像是天生的。他本人熟讀《三國演義》及《資治通鑑》等中國傳統權術之書，

毛澤東面對的困難在於，在1949年後哪裏去找一個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呢？他終於找到對象，而且理由是頗為動聽的。這個名詞是「黨內資產階級」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也熟讀列寧及史大林的鬥爭著述。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中國傳統著述遠多於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他以超凡的個人魅力，配以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土壤，將極權主義推向極致。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排除了他的政敵以及其他守舊份子。他以個人崇拜的方式試圖改造人類，「靈魂深處鬧革命」。這就是為甚麼直到現在，西方的左翼知識份子至今仍認為文革帶有民主成份的原因。

文革的破壞力實在是驚人的。中國官方的數字也承認，在文革中有2億人受到迫害。大躍進加上文革的死亡人數高達6,000萬。中國社會動亂的真正根源，是中共黨內的權力及意識形態鬥爭。這種制度必須改變相信已是中共高層的共識，不過毛澤東一日在世，他們都動彈不得。文革結束時，毛澤東已經是老朽了。當周恩來病入膏肓時，他不得不徵召「走資派」的第二號人物——鄧小平——復出施政。而毛澤東落得一個「現代秦始皇」的稱號，當人民在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高喊秦始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不復返時，毛澤東的聲威及其生命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五 改革開放：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搏鬥

本質上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在是回到中共八大的主旨，就是應發展生產力以實現工業化，以求國家之富強。這樣，中共又回到了民族主義的論旨。不過，從1956到1978年，畢竟時光已溜過了二十二年，歷史不可能是簡單的重複。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極權體制的「撥亂反正」，從瘋狂的階級鬥爭移向國家的經濟發展。不過，不論是階級或國家或民族都是屬於集體主義的範疇，而集體主義都有狂熱的成份。1978年後中共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舉。政治改革的對象是中共體制本身，而經濟改革的對象則是整個中國的資源生產與分配制度。這二者是有分別的，而改革速度也不同。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三十年可分為兩個時期，前十年和後二十年，以「六四事件」為分界線。前十年，政治改革及經濟改革基本是並駕齊進的。鄧小平在胡耀邦及趙紫陽的扶助下，對中共黨政架構實行大規模的改革，總目標是「制度化」及「民主化」。國家的憲法得到確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肯定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差額選舉在黨代表大會中實踐了，領導層的任期被規範，接班人的標準明確化了以及制度化了，黨政架構也大大精簡了；等等。在這十年中，雖有保守派高層提出反對「精神污染」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然而大勢所趨，政治氣氛寬鬆持續。

經濟改革的步伐則更快——「農村包圍城市」、家庭承包制的引入、人民公社的崩潰、經濟特區的設立等。1984年，改革推向城市，趙紫陽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正式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雷厲風行的政經改革令到1980年代成為中共立國以來政治最為寬鬆的年代，當時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肯定知識份子的「創造必須是自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提出「科研無禁區」之說，安徽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

本質上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在是回到中共八大的主旨，就是應發展生產力以實現工業化，以求國家富強。這樣，中共又回到了民族主義的論旨。不過，從1956到1978年，時光已溜過了二十二年，歷史不可能是簡單的重複。

長方勵之公開批評馬列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金觀濤指出社會主義實驗在中國失敗的論點等，觀點尖銳。史學家包遵信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在青年知識份子當中影響廣泛，蘇曉康的電視片集《河殤》對中國文化全面批判，引起強烈共鳴²⁰。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秩序引起深刻的變化，這個變化如已故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所論述²¹：

鄧小平的政策所引起歷史重要性在於這點：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政治不斷滲入社會各方面的潮流終於停止了。這種撥亂反正意味政治干預／或控制社會的局面被逆轉了；換言之，政治權力和社會的關係進入了另一個方向。

對鄧小平來說，市場機制只是一種資源調配的機制，可以隨時拋掉，也可以隨時應用，好像一個茶杯一樣。但從歷史發展看，市場機制嵌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它是一個社會秩序並且與政治制度不可割離，是不斷變化的。

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黨政力量退出社會意味退出個人的生活圈子，由此而引致個人／個體意識的蘇醒。捷克著名小說家昆德拉 (Milan Kundera) 曾說過極權主義最可怕的特徵之一，是所謂黨國對「私隱的蹂躪」(the rape of privacy)。從這個意義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令到中國如美國一位學者的文章題目所言——〈私隱在中國的重新出現〉(“The Re-emergence of the Realm of the Private in China”)²²。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個人意識的蘇醒是由一股客觀結構性力量所支持的，就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力量。鄧小平在中國引入市場經濟的時候曾經說過，市場機制是中立的；它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對他來說，市場機制只是一種資源調配的機制，可以隨時拋掉，也可以隨時應用，好像一個茶杯一樣。但事實不是這樣，從歷史發展看，市場機制嵌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它是一個社會秩序並且與政治制度不可割離，是不斷變化的²³。

市場經濟是一個人與人之關係的制度。這個制度假設個人是最高的欲望主宰，個人也是有選擇自由的。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制度聯繫在一起。以私有財產為基礎而假設個人有選擇自由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是自由主義思潮的基石之一。由個人擁有在經濟上的選擇自由開始，進而擴展至政治及社會自由，就構成現今的人權思想。海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曾論證沒有私有財產基礎以及選擇自由的經濟制度，只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費里曼 (Milton Friedman) 論證「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 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²⁴。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已經將個體主義的「潘朵拉盒子」打開了，除非中國再倒回去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政治年代，否則個人的蘇醒以及主體意識只會愈來愈強，替民主政治的出現奠下了一個客觀而必須的基礎。

然而，鄧小平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主觀意圖並不是要實現現代民主政治，他不過是想改變中共的執政方式，從而鞏固中共的專政地位，以及滿足人民大眾日常需求而已。他的思路可以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心是經濟發展；兩個基本點分別是改革開放及四項基本原則。然而，兩個基本點其實是兩股互為衝突或矛盾的力量。改革開放最終帶來的是個體的解放，自由心靈的飛揚；而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則是當政者或執政黨以集體的名義，如階級／國家／民族／社會等施行政治控制，以限制人民的權利。這兩股力量激烈地搏鬥着²⁵。

如前所說，1980年代是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並舉的時代；換言之，人民經濟權利的擴展同時伴隨政治及社會權利的擴充。但是「六四」之後，這種並行局面驟然而止。中共發現政改走得太前會危害本身的執政地位，於是政改全面停頓，經改的步伐則更加快速。中共明顯地以經濟發展的成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針來換取人民對政治及社會權利的爭取。這一政策，似乎至今未改²⁶。

「六四」之後的二十年，中共基本上放棄了結構性的政治改革。整個1990年代只有國務院的兩次精簡架構以及所謂基層民主的選舉反響較大。前者只是官僚體系內的一種行政改革；後者涉及政權體制外的村民代表委員會的低級職位，完全不具重要行政權力。胡錦濤上台後的「黨內民主」措施比江澤民時代倒退一步，由社會民主收縮為中共黨內的民主，客觀效果是黨內和社會醞釀更大的矛盾；國家／政府和人民的權力關係更為懸殊。在中共壟斷權力和資源的情況下，「黨內民主」令到中共全黨利益趨於一致，在意識形態和利益均沒有重大分歧下，所謂保守派或改革派缺乏了存在的根據。中共可能正變成一個維持自身利益的政治權力集團，沒有保守派及改革派之分了。黨國和人民的矛盾會進一步分化。

另一方面，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機制所帶來的必然後果。這一點恐怕鄧小平及趙紫陽等改革者也未必認識到，他們只把市場機制當作中立的資源分配／生產的工具而已。他們未認識到市場經濟是把個體當為生產者及消費者單位，然而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勤力或懶惰、聰明或愚笨、靈巧或笨拙，選擇自由帶來分化；因此，社會長期來說貧富不均一定會出現。在西方，國家會通過均富政策來減少這種分化，但是，這要假設統治精英是英明且有效率。在中國，由於中共的龐大壟斷利益集團的存在及官僚體制的貪腐，這種分化已經變得兩極化了。

在中共壟斷權力和資源的情況下，「黨內民主」令到中共全黨利益趨於一致，在意識形態和利益均沒有重大分歧下，所謂保守派或改革派缺乏了存在的根據。中共可能正變成一個維持自身利益的政治權力集團，沒有保守派及改革派之分了。

六 中國的未來：從集體主義轉向個體主義？

從清末到1949年，中國的革命知識份子從事救亡運動，在1949年成功地建立了一個不受外國侵略及勢力佔據的國家；跟着的工作應該是經濟建設及民族發展。可惜毛澤東過早地將「階級」代替「民族」，以內耗代替建設，在和平時期實行革命鬥爭，結果是造成民族大災難。改革開放後，建設又成為中心，民族主義又成為主軸。但是在民族主義的集體旗幟下，社會政治架構起了分層變化。毛澤東也許有預知的能力，他知悉中共會蛻變成一個利益集團，會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出現，不過他採用的卻是大鬥爭的解決方法。這個教訓應該吸取。

現在，解決中共作為一個特權階層的方法是要用和平的方法，就是中共自己蛻變成一個民主政治中的執政黨。「一黨專政」的制度是一個歧視性的制度，它只容許某部分的人（共產黨員）成為決策者，剝奪絕大部分人民的天然權利。在「大國崛起」聲中，中共應該放棄專政所依據的集體主義，而歸向二十一世紀的普世價值——個體主義，實行保護所有中國人的權利為中心的政策。在建國一甲子的時刻，中共必須發展現代的民主制度，以解決當前中國社會所面對的種種政治社會危機，這其實已是許多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的共識了²⁷。

註釋

- ① 例如殷海光及金耀基等學者的著作。
- ② 陳耀南：《魏源研究》（香港：乾揚出版社，1982）。
- ③ 方志欽、劉斯奮編注：《梁啟超詩文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頁26。
- ④⑧⑩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311-41；7-49；192。
- ⑤ 轉引自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頁223-24。
- ⑥ 王曉秋：〈清末中國形形色色的明治維新觀〉，載《世界歷史》編輯部編：《明治維新的再探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43-52。
- ⑦ 讀胡適、蔣夢麟等著名學者的自傳，就知道《天演論》的影響之大了。
- ⑧ 日本侵華無疑是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也公開承認日本侵華是中共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參見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和委員黑田壽男的談話。
- ⑨ 參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730-845。
- ⑩ Robert C. Tucker,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0).
- ⑪ 參見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1879至191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 ⑫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頁584-617。
- ⑬ 趙紫陽：〈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日報》（海外版），1987年11月4日，1-4版。
- ⑭ 可參見英文著述中寫得最好的史大林傳記，Isaac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⑮ 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著，于平凡等譯：《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頁202。
- ⑯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94).
- ⑰ 事實上，西方的一些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頗為欣賞毛澤東的這個觀念的。參見Paul M. Sweez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Mao Period", *Monthly Review* 28 (February 1977): 9-10。
- ⑱ 參見王耀宗：〈鐘擺與螺旋：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改革〉，載王耀宗、陳可勇合編：《神州六十年》（香港：法住出版社，2009），頁109-40。
- ⑲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51.
- ⑳ Orville Schell, "The Re-emergence of the Realm of the Private in China", in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ed. George Hicks (Chicago: St. James Press, 1990), 419-27.
- ㉑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 ㉒ Friedrich A. von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 Paul, 1962);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㉓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㉔ 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 ㉕ 朱學勤主編：《為生民立命——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文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